

杜维明：心性儒学的政治面向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阅读量：794

心学的文化与政治含义（上）

导读：上次我们讨论到“以身体之”的“体”所指引的知识内化与学以成人。今天我们将进入“心”这一主题。毫无疑问，在身、心、灵、神当中，心是最为核心、最为丰富的一个层次。之所以核心，是因为从孟子到阳明，“心”始终是修身成人的中心；之所以最丰富，是因为“心”关切的远远不止是一个人自身的心性修养。无论大体小体，还是人与社会、人与天地，都是一体贯通的。“心学”不仅仅是道德修养之学，而是同时有着深厚的文化与政治意涵。

2010年7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心学的文化与政治含义——杜维明思想研讨会”。会上，杜先生对他的哲学思想主旨作了阐释和总结，并逐一回应了与会学者的评论和问题。在这次讲话中，杜先生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心学的文化与政治含义：

首先是对心学传统的考察和当代世界哲学转型的反思。心学的根基在孟子到阳明的心性之学，从人之为人的根本开始，推己及人到各种家庭、社会、政治问题，甚至从哲学反思到文明对话都离不开心学关于人的基本看法，今天对心学的推动将有助于打破中国哲学学术与思想对话的困境；

其次是对恻隐之心的深入思考及这种思考对当今儒学复兴的重要意义。心学认为人性的根基在于恻隐之心，而今天我们要走出近代史上的启蒙心态以开辟儒学复兴的全新道路，要回到儒学根基上开发出一套全新的现代儒学思想体系；

第三点是面对21世纪，要把儒家放到多元宗教的体系里来考察，让儒家更加具有开放和对话的精神，对普世价值的相关命题展开讨论，从而深化世界文明对话的成果。

接下来的两次推送，我们就将以杜先生的这次讲话为中心，对精神人文主义在个人这一维度上，在“心”这一主题下的内容加以展开。

（本文由温海明与 Ralph Weber 整理，省略评论者的发言，并就杜先生的发言做了删节。二级标题为编者添加。）

一. 心学传统与哲学转型

1 恻隐之心的推扩

孟子所谓的“性善”强调的是人和所有动物不同的地方：人和动物大概99.9%是一样的，他想要提出的就是“几希”，即0.1%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恻隐。谈到恻隐，还有由恻隐往外推的问题。这就谈到了孟子所谓的“大体”。我认为“恻隐之情”，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人的本质定义；但是一谈到本质，大家又感到是一种本质主义。Roger Ames（安乐哲）提出对于个体的特殊性就是本质，一定要找人的本体，人的普遍性。

这个议题现在有兴趣的人不多，可能已经被解构了，特别是在后现代已经被解构了。我坚持这样的观点，目的是想说明一般在西方没有出现或者说出现比较晚的观念，像身心、灵性，在中国很早就被当做一个复杂体系。中国传统中理解的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或者是可以用语言的动物、可以用工具的动物，而且更是感情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还是追求意义的。孟子提出这个“大体”的问题，在一个 0.1% 的特殊性中建构他的“大体”概念。这种说法大家都不太重视，认为是过时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大问题，是经济建构的问题，还有经济发展之后软实力向外推的问题。我们对西方以前发展的模式有了超越以后，走出一条不同的路：现代性当中传统的问题，乃至现代化有各种不同文化形式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

虽然人之异于禽兽者只是“几希”，但从这几希的“恻隐之心”向外推，就可以“养其大体”，甚至从“大体”谈到“万物皆备于我”。这种概念绝对不是修养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问题。我们常常把这一套思想当做个人的修养，乃至道德哲学的特殊课题，认为这个课题只是与我们今天碰到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民主问题相关，我认为这个看法可能把心学里面最核心的问题看得简单了一些。以家庭为例，从“推己及人”这个“推”的观念来看，家庭在性别、年龄、伦理上的复杂性就很有需要“推”，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不管是父亲还是孩子——不愿意参与家庭生活，不愿意主动自觉地建设这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几乎不太可能维持和谐。

2 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心学所碰到的困境是这样：我们原来所建构的一个全面、内在整合的一种思想，面对西方各家各派内部的张力，对我们内部本身思想的挑战。除非你把他们剥离出来，不和他们进行对话，或许可以保持多多少少的纯净性。但是这种对话能够在现代社会起积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心学必须有内部重新的调整，调整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的问题，要引用各种不同的源点来支撑我们的论据，这是大家基本上都接受的。

如果我们要进行文明的对话，假如我们不仅坚持要依赖我们的文本，甚至还要必须仅仅依靠我们古代汉语作为唯一交流的工具，那么我交流的对象如果不了解古汉语，他就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心学，我跟他对话的可能性就小了，这样的态度是自我封闭，不可能真正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可以用中文、日文、法文、德文了解基督教，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而不必用梵文了解佛教。儒学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就是能不能走出东亚，如果要走出东亚，基本上应该接受翻译，翻译的本身是一种创造——要接受各种不同语言的挑战，一定要对他对话的对象的内部的复杂性有基本的认识。

在英语世界，其研究哲学有各个不同的面相。另外，做哲学和了解哲学、认识哲学有很大不同。做哲学就是你思考的本身，必须要和你现在所碰到的各个大问题之间有一种实际上的碰撞，这个难度很大，尤其是做中国哲学。从自身的学术上来看，大家认为你现在做的工作学术性不够强；从西方的学术来看，他们认为你接触他的问题，你的问题意识不够强。所以这两方面，都要同时加强。如果要加强，那么这新学术能展现出来的面貌将会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非变不可。但是虽然变，我们要问的一个

问题，就像陆象山所说，“读《孟子》而自得之”的可能性有没有？这涉及体知的可能性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和经典有亲和性，他们会发展自己创造的诠释，那种可能性会开拓出来。

假如说哲学过分专业化，且局限在一个圈子里，那么哲学便会被慢慢消解掉，变成一种技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哲学视野如果仍局限于一种风格或某些地域，就不会有更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中国哲学的问题，中国哲学自身要进一步发展。上一次一个老外来了以后，说中国没有哲学，引起了很大的辩论，归根结底是“中国哲学”还是只是“哲学在中国”的辩论。另外，怎么样才是哲学研究，与西方的哲学界进行平等地位的对话，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厢情愿。只是需要经过一个核心价值的对话，这中间不仅牵扯哲学家和知识分子。

3 内在超越、天人关系与精神转向

在五四时代，杜威在中国两年或者更长，他和冯友兰几乎没有真正的文化交流，但他在中国的经验对于他的哲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作用的显现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文化的资源，广结善缘。儒家学者认为《中庸》、《孟子》或者是《易传》有超越，有所谓“内在的超越”，如果说是“天命之谓性”，以这个方式，就和孟子进行知性知天连在一起，可以从个人的自我了解来了解天；但在基督教里面，人和上帝的关系是正好相反的，上帝是超越，是另外一种超越。这中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地球问题的出现，使得这些传统都要有所改变。我再用一个值得批评的观点，儒家的传统只有一种语言，没有其他的特殊语言。孔子说“下学而上达”，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个精神的转向认同世界，最高的精神意义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体现，没有更大的、另外的、完全超越人类的世界，我们讲“内在的超越”。大家可以批评。但是这一条思路是从这边发展出来的，我们在 21 世纪，面对人的存活问题，重新思考何为人以及知、行，有什么希望？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不仅面临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处理人和地球的关系。另外，我认为，21 世纪所碰到的问题，是必须要发展全面而且整合的人文精神，把它当做我们要关切的大事。在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处理这些问题要注意三个方面，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社会，一个是自然。个人的身心问题，个人的社会健康问题，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大家认为这三个问题处理好，我们面临的问题就可以处理好了。但是，只注意这三方面不够、为什么不够？在 21 世纪，跟 19 世纪后叶和 20 世纪初叶最大的不同，就是宗教问题，21 世纪大家对宗教的问题越来越敏感，假如说 21 世纪的领袖对宗教问题不敏感，他会碰到很多不能解决的东西，而且可能出现非常多、非常严峻的问题。宗教问题的出现，是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人的意义问题，都是 21 世纪不可消解的大问题。正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所说：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很不值得活。

我们大家都了解在 1980 年代、1990 年代，如钱穆、张世英、季羨林等，他们都曾讨论，而且前卫性地提出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人性跟天合一的问题。现在很少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在我理解的问题的框架之中，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跟其他的轴心文明相比，儒家

的“天”的属性是什么，这又有太多的争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冯禹的博士论文，整篇都在讨论人的属性问题。这中间不仅有人定胜天的传统，还有天人合一等各种类型，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轴心文明通过超越和突破所展现出来的最高价值。非常有特色的便是“天生人成”的观念——人和天之间的互动。当然，很多人会把这种观念误解为“人定胜天”。大禹治水、诺亚方舟的传说表明，人在那个时候就接触了自然；但大禹经过治水，把灾难变成灌溉。大家认为其文化寓意与愚公移山是一样的，即人的努力和智慧可以征服自然；我认为完全不一样。愚公移山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愚蠢而且没有生态环保意识的一种人定胜天的观念，而大禹治水完全是另外一个方面，在中国，天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但绝对不是无所不能，所以中国就没有出现基督教里面全知全能的上帝观念。如果从中国传统和儒家的传统来看，人的出现使得天不可能是无所不能，也就是说，人和天之间有一种不仅是默契而且是交流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在宇宙大化的过程中，人是一个观察者、欣赏者。《中庸》里面讲得很明白，人不仅是“参赞天地之化育”，而且“与天地参”，因此我们不能只从个人、社会和自然来了解人文精神的全貌，还一定要把“天”的问题讲好。

在我看来，哲学界正要发生且应当发生一种“精神的转向”。哲学史上曾经有认识论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人类学转向。精神的转向以前不提，因为被认为属于天主教的传统。但是德里达在去世之前，重新提到犹太教里面的核心问题；列维纳斯也是受到犹太教的基本教育，晚年，他又回到犹太教，回到希腊哲学，把哲学作为生命的哲学；福柯在晚年专门讨论修身的问题，谈到要关切人、关切生命。现在有很多人谈关切地球。

面对 21 世纪，如果有一种比较涵盖性、整合性的人类思想，儒家无疑是非常杰出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可以涵盖一切。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涵盖一切且非常具有整合性的文明形态，意识形态也好，精神文明也好，宗教传统也好，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三大宗教都是涵盖性的，但儒家的涵盖性是多元的，还有很多不同的涵盖性。它只有一种语言，没有教条。它超越的突破在当时是孔子主动自觉的选择，不是因为孔子不了解外在超越的重要性。儒学的超越是具有普世意义而且比较全面的人文之学，儒家有它的特色，而我们有责任把它的特色凸显出来若要体现这特色，有几个大关必须过。

4 心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第一个大关就是心学.当然除了心学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思路。如果顺着心学的思路，心学所谓的性善问题，我们必须能够像康德一样严谨地建立自己的体系和论证。康德关于信仰的一些预设如灵魂不灭、上帝存在等，在他整个思想当中是不甚协调的，为什么有矛盾？因为这些观念和他整个哲学 之间是有矛盾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要通过论证，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说：西方的思想特别是基督教.认为单凭自己的力量成就圣人是不可能的，我们则认为可能，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予以肯定。那么，我们怎么论证？这是第一个问题。

下面的问题就更复杂了.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儒学所展现出来的人类世界，要向外推，不管是到家庭，还是到国家。**儒家有没有制度建构？这个制度建构是哪一条路？**有些人认为政治儒家和精神儒家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是矛盾冲突的，其实不然。制度和道德紧密相关，假如双方没有互动、博弈，制度化的儒家真正对话的伙伴都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和儒家的心性之学分开，认为这一套过时了，这样的话，一方面心性儒学工作没有做好，没有把可以开展的发展出来；另一方面制度儒学的这些学者，对于自己源头活水的最珍贵的东西，也没有做好。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大问题，就是**如何知**的问题，一般儒家把知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闻见之知”是可以发展科学，良知则是一个道德理念。这些问题现在有很多的争议.其中一个就是良知的坎陷问题.良知必须自我坎陷才能够开发出民主，开发出科学。良知这个道德理性想对于知识的理性加以涵盖统摄，于是很多人认为这是“道德的傲慢”。但是我认为这能走出一条路来，即走良知扩大的路子。所谓良知扩大，我们不把“德性之知”认为是道德之知.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道德实践的东西；它是一个本体，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观念，可以从人的经验来证明，从其他的方式来讨论。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大问题。

坦率地说.这种问题西方哲学研究两百年，每一个细的东西都已经攻破了，单就研究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就有成千上万的文章.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的差距还很远。另外，更麻烦的就是，西方对于自己传统的启蒙，做了最全面和深刻的批判。不管是从理性主义，从环保主义，从社群主义，从文化多元主义，或者从宗教的多样性，现代化和多样性.这一些都是西方开出来的.他们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反思。而我们现在还存在什么样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现代化，我们还了解启蒙，我们还要启蒙，我们想超越启蒙，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梦想.而且是不符合现实的，不仅我们想要超越启蒙，我们想在超越启蒙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宽广的人文问题.那更是一个梦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和情况下，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或者说我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傲慢，有这样一种理想。我认为，一个新的环境的出现，这是以前人类没有出现的，西方哲学的积累，思想上的积累，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要尽量向他们学习，不管是哪一个人，不管是哪一本书，不管是哪一个学派，所以你要能够进入一个学派，进入一个人，这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意愿或者没有这种功夫，要想能够做进一步的哲学思维，困难就非常大。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Rxjd025lvD_5v_L--tjcvg